

· 专题论坛: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研究 ·

毛泽东致民主党派及知名人士书信中的文风探析

韩志宏

(信阳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毛泽东一向高度重视文风问题。他不但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的优良文风,而且在实践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致民主党派及知名人士的信件中,他那种独特而鲜明的文风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其特点主要有:文字精练与言之有物相统一,对象不同与有的放矢相统一,语言朴实与富有文采相统一,篇幅长短与工作轻重相统一,人物众多与称谓贴切相统一。研究毛泽东的文风特点对当下党的文风建设具有极强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民主党派;知名人士;书信;文风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6)06-0005-05

毛泽东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1]812}人们从文风的状况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进而评价党的形象。因此,为了树立党的良好形象,毛泽东身体力行,采取生动活泼、鲜明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为全党树立了榜样,做出了表率。毛泽东一生不仅创作了大量的理论著作,而且写了大量的书信。《毛泽东书信选集》选收了毛泽东在1920年至1965年期间的372封书信,其中有一部分是写给民主党派及知名人士的。这部分书信见证了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同民主党派及知名人士的交往历程,是其革命和建设事业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书信不仅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高尚的品德和超人的智慧,以及他为建立统一战线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付出的巨大心血,而且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坚持和倡导的马克思主义鲜明文风——文字精练与言之有物相统一,对象不同与有的放矢相统一,语言朴实与富有文采相统一,篇幅长短与工作轻重相统一,人物众多与尊老敬贤、称谓贴切相统一。

一、文字精练,但表达情真意切、言之有物

毛泽东的文风向来以准确、鲜明、生动而著称。他曾经强调:“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1]834}他的书信大都是为了答复疑惑或解决具体问题而作,因此,语言删繁就简、言辞真挚恳切、表达准确到位,表现出极高的语言驾驭能力。下面仅

举3例,予以证明。

1949年6月1日,新政协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亲自写信欢迎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澜等到北平商讨国是、参加共同建国。此信虽然篇幅不大,但是语言精练、表达到位,诚挚之情溢于言表。信的正文内容如下:“艳电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2]323}全信正文虽然仅有54字,但至少明确表达了四层意思:一是说明当时的战争形势,全部歼灭国民党军队的任务就要完成;二是战后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好建设;三是搞好建设的方法,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四是,对两位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同商量建国大业表示诚挚欢迎。在这四个层次中,每一个层次只用10余字就完全表达了当时的形势、任务、方法、目的等意思,没有一句空话,没有一个废字,足见语言之简练、表达之准确。并且文中几个副词“敬”“亟”“极”鲜明地表现出毛泽东对张澜的尊敬以及真挚的欢迎之情。

同年6月,毛泽东邀请宋庆龄到北平商讨建国大业的信,正文只有71个字,但其敬仰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觅待高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守希驾葆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2]326}

收稿日期:2016-09-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5BDJ047)
作者简介:韩志宏(1982—),男,河南博爱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及文风研究。

短短几句话,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分别4年之久,但敬仰之情却越来越深;二是革命即将胜利,特派邓颖超专诚去迎接宋庆龄来北平参加新政协第一次会议;三是真心期望宋庆龄不要拒绝。从中可以看出,对于这么重要的大事,毛泽东短短数语即已说明,表达言简意赅。而其中的“忽”“特”“专”“敬”“祈”等字简练、准确、鲜明地表达出毛泽东对宋庆龄的诚挚而热切的邀请之情。

1949年10月,著名哲学家、爱国民主人士、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有感于开国大典的盛况,激动无比,结合自身的曲折经历,决定上书毛泽东,表明好好改造自己的态度和决心。毛泽东的回信,也是通过短短数语,全面而准确地表达了几个意思。信的正文内容如下:“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想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2]344}信的正文至少有四层意思:一是共产党欢迎任何人进步;二是先生从旧社会过来,敢于正视并在实践中改正错误,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三是思想改造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慢慢来,否则欲速则不达;四是在改造的过程中,态度很重要。这里,毛泽东以近似白话的语言,简明而生动地表达了对旧知识分子的关注、支持和帮助之情,也表明了毛泽东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不能急于求成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由上可知,毛泽东的该类信件虽然惜墨如金、文字精练,但是表达准确、言之有物、条理清晰、情感真挚。

二、针对不同对象,讲究务实求效、有的放矢

毛泽东一生广交深交党外人士,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交往的民主党派及知名人士可谓众多。他根据交往对象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异、交往深浅的差异等,在致信中也表现出明显不同的语言风格,但均切合实际,有的放矢,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正如他所讲的那样“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1]836}。

毛泽东主动致信旧时好友易礼容,以旧谊为突破口,力求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自1918年起,毛泽东与易礼容同为新民学会成员,一起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易礼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6年,当毛泽东得知易礼容在上海从事国民党的工会工作,并与毛泽东有合作之意时,当即致其一封信。由于毛泽东与易礼容相交甚早,又具有较好的旧谊基础。因此,

在信中,毛泽东以往日的友谊为切入点,对其表达关心、同情以及希望进一步合作之意。具体来讲:一是毛泽东以“韵珊兄”作为称谓,可谓煞费苦心,亲切之感跃然纸上、暖在心间,立即拉近了两者的感情距离。因为,易礼容乳名为“韵珊”,只有儿时熟知并亲近的人才会如此称呼,表达了两人的密切。再者,两人多年不通音讯,刚刚联系上就以“韵珊兄”称之,足以显示亲切之感。二是正文中“吾兄”“知兄”“兄之苦衷,弟所尽知”也进一步表达了毛泽东对易礼容的尊敬、同情。三是毛泽东希望通过易礼容表达对其妻及与其有联系的老同事的问候之情,如“有便乞为致意”“闻兄之周围有许多从前的老同事,甚为怀念他们,希并致意”“文煊还在你身边否?她好否?一同致意”等,进一步使易礼容忆起旧时情谊,拉近了彼此距离。四是叙完旧情,毛泽东随即道出想请易礼容力促共同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可谓水到渠成。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力促成之,自然而然地使易礼容比较易于接受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至少没有反感情绪^{[2]47-48}。可见,毛泽东致易礼容的这封信,巧妙并紧紧抓住两者的旧时情谊以及共同从事革命活动的有关经历,然后有针对性地说明当今局势,希望进一步加强联合,力促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

1936年,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曾到保安(今志丹县)采访过毛泽东,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7年,鉴于国内抗战形势的变化,为了突破国民党对共产党宣传媒体的封锁,毛泽东特致信斯诺,请求其帮助宣传关于共产党抗日政策的新变化等事宜。该信篇幅不长,先略略数语表达对斯诺的想念之情和问候之意,然后表明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政策有了新动向,请加以广为宣传。具体来讲:一是进行问候,表达想念之情。“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通过简短问候,使人觉得亲近。二是我们的政策有了新变化,请帮助多加宣传。“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传”^{[2]100}。这是致信的主要目的,就是请斯诺对共产党抗日的新主张、新政策进行宣传,让国内外进一步了解,获得外界同情并支持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进行抗日。三是表达感谢。如果斯诺能向世界人民进行宣传,共产党是非常感激的。

同样,1937年,毛泽东对国统区《大公报》著名青年记者范长江的致信风格也是基本如此。“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可能时祈为

发布”^{[2]102}。一是毛泽东对范长江进行问候,并对其前期的帮助宣传表示感谢。二是有一份谈话稿和清明节祭陕西黄陵的文章,在可能的情况下,请帮忙予以发表。

1939年至1944年,毛泽东致信在延安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作家、学者等,主要从知识分子的特点和任务出发,对他们进行关怀引导,鼓励他们结合实际,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多出一些反映共产党、红军及解放区普通人物新变化等的作品。如1939年,萧三在延安从事文艺工作,毛泽东在致他的信中指出:“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2]155}毛泽东不仅对萧三的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而且希望其结合生活实际,多出一些反映战斗的作品。又如1940年,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毛泽东在致他的信中,表示:“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2]163}这是鼓励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和批判旧学术。还如1941年,著名作家萧军在延安从事文化工作,对延安文艺界等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毛泽东从关心帮助的角度,耐心诚恳地对其进行劝导教育,使萧军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2]174}。毛泽东虚心诚恳、分寸适度的规劝,使萧军得到了感化。

当然,毛泽东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的信件也较多,大多是解决国家大事、表达问候关怀和邀请讨论问题的。对待这些著名民主人士,毛泽东更多体现的是尊老敬贤之情,以及发挥这些旗帜型人物在革命和建设“振臂一呼、响者云集”的巨大作用。因此,从毛泽东致民主党派及知名人士的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根据致信对象和目的的不同,其信件所体现的文风也各不相同,或是先行叙旧问候,再道出请求,或是先行肯定鼓励,再提出希望与要求,但是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而不是泛泛而谈。

三、语言朴实且富有文采

毛泽东文章的语言风格是独特而鲜明的,针对国民党左派元老、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等致信对象的不同,他的语言又是富于变化而多姿多彩的,或采用文言文,或采用白话文,或文白并用,让我们看到其语言朴实之中兼具文采的一面。

对国民党左派元老、著名民主人士致信以文言为主。国民党左派元老、著名民主人士,其中许多是清朝末期的饱学之士,有的虽未取得功名,但也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其经常和习惯使用的是文言文。因此,毛泽东与其书信交流时,便首选文言文,不仅便于沟通,而且以示尊重之意。如毛泽东致柳亚子、张澜、叶恭卓、齐白石等的信件,均以文言文为主。如:“迭示均悉。最后一信慨乎言之,感念最深。赤膊上阵,有时可行,作为经常办法则有缺点,先生业已了如指掌。”^{[2]263}(1945年,致柳亚子信中的语句)其中,以“赤膊上阵”做比喻,生动形象,富有文采。“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致谢意。”^{[2]448}(1952年,致齐白石的一封短信)该类信件中虽然运用一些文言词语和文言句式,但并不显得晦涩难懂,反倒增添了庄重典雅的文采韵致。

对在延安工作的作家、文艺工作者等党外知识分子的致信以白话文为主。这些知识分子主要在延安从事小说、新诗等文学艺术创作,平时用白话文居多。因此,毛泽东与其书信交往,自然以使用白话文为主。如毛泽东分别致萧三、萧军、丁玲、欧阳山等的信,均以白话文为主。如,“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2]448}(1941年,致萧军信中的语句)。“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2]233}(1944年,致丁玲、欧阳山信中的语句)

对其他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等的致信,或文或白或文白并用。如1944年,当毛泽东看到老朋友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时,致他的信就文白并用,读来朗朗上口:“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的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2]241}

当然,毛泽东致同一个人信件的语言风格,也会受时间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此种情况也比较多。如1948年,毛泽东致沈钧儒、李济深的信以文言文为主,“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2]301-302}。但是,1953年毛泽东致沈钧儒的一封短信,则以白话为主:“九月十六日

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2]464}

四、篇幅长短不一,力求围绕工作、收放自如

毛泽东致民主党派及知名人士信件篇幅的长短,不是以致信对象的不同来定,而是围绕事情和服务工作大局,以需要研究探讨解决的现实问题的复杂程度等情形,来确定信件篇幅的长短。正如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讲的,既要“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又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1]834}。此类情况可大致分为事情重大、但篇幅较小,事情重大、篇幅也较大,事情较小、篇幅也相对较小等几种情况。

事情重大,但篇幅相对短小。对于阐明中共抗战立场、邀请民主人士协商建国等一些虽然重大,但不需要详细阐述的问题,毛泽东一般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地加以说明。如1944年,毛泽东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续范亭的一封信仅有31字的,鼓励其将撰写的揭露阎锡山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滔天罪行的文章进行发表,使解放区和国统区许多人看清阎锡山的真面目。又如1946年,毛泽东致爱国民主人士马叙伦等人的信,仅用77字对其为和平请愿而受到迫害,表示愤慨与慰问,同时重申了中共中央坚决与全国人民一起反对内战的立场。还如1949年,毛泽东用不到60字的篇幅致信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澜,邀请其来北平参加新政协,商讨建国大业。1950年,致信陈叔通商议商业改造等经济社会重大问题,明确指出了改造方向和政府应发挥的作用,全篇仅用不到100字。

事情重大,篇幅也相对较大。对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经济政治等一些重大并且需要论述的问题,毛泽东会浓墨重彩地进行阐述,力求把有关问题剖析说明到位。如1936年,毛泽东用将近400字的篇幅致信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向其说明共产党所执行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与政策,表达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热切期盼。再如1938年,毛泽东给青年记者范长江的一封信,用了1150余字详细解释国共两党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又如1952年,毛泽东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时任副总理的黄炎培的一封信,用800余字阐明资产阶级改造问题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必须从我国社会实际情况出发来制定相关政策。

事情较小,篇幅也相对短小。对于与朋友、同事

等进行日常问候、关心鼓励、探讨诗文学术等这些较小的事情,则篇幅一般也比较短小。如1939年在延安,抗大学员柯蓝请求毛泽东为其姐姐的孩子起名。毛泽东仅用短短20个字,就把给小孩儿取名这种小事情解决了。又如1939年,毛泽东回信对萧三文学创作进行鼓励、参加高尔基晚会和马匹使用3件事情,仅用100余字即已完全表达清楚意思;1944年,毛泽东致丁玲、欧阳山的一封信,也是只用100余字,对两位作家在创作风格上的转变以及取得的成功进行鼓励表扬,生动体现了毛泽东对作家成长进步的关爱。此外,对一些爱国民主人士、老朋友沈雁冰、柳亚子等进行嘘寒问暖、探讨交流诗文等的信件也比较短。

因此,毛泽东致信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等,信件篇幅的长短主要根据工作需要探讨工作的重要性、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毛泽东想要表达的内容等来确定,做到可长可短、收放自如。

五、对象众多,注重尊老敬贤、称谓贴切

称谓可以生动表现交往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对对方的态度以及尊重程度。毛泽东根据交往对象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称谓。在毛泽东致民主党派及知名人士的书信中,对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爱国民主知名人士等均尊敬有加,如使用表示尊称的“先生”“字”“号”等。信中对不同类别的人称谓也各不相同,且对同一个人的称谓也会根据情况的变化而随之改变。总之,毛泽东致信称谓力求做到妥当贴切,真诚地表达敬意。

对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外国友人等,称为“某某先生”,其中,“某某”又可分为“名”“字”“名加字”“号”等不同情况。一是“某某”为名的。主要有:在1936年给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诸领导人表达欲密切合作,促进统一战线建立的信中,称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为“乃器行知钧儒韬奋先生”;1937年致外国友人斯诺,希望其对共产党新政策加以宣传的信中,称其为“斯诺先生”;1938年2月致著名记者范长江,对其提出的问题进行答复的信中,称其为“长江先生”;在1944年致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李鼎铭,感谢其推荐并评价《永昌演义》一书的信件中,则称其为“鼎铭老先生”。二是“某某”为字的。主要有:在1948年致吴晗感谢其撰写《朱元璋传》的信中,称其为“辰伯先生”;1949年致张澜,邀请其共商国是的信中,称其为“表方先生”;此外,称爱国民主人士刘揆一为“霖生先生”、数朝元老叶恭卓为“誉虎先生”、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为“行严先生”等。三是“某某”为名加字的。

主要有:称仇鳌为“仇亦山先生”。四是“某某”为号的。主要有:在1951年致出版界著名人物张元济,对其表示感谢和关心的信中,称其为“菊生先生”;致著名画家、爱国民主人士齐白石的信中,称其为“白石先生”等。

对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和接受过教导的老师,表达崇高敬意,则称“某某老”,其中,“某某”一般为“名字中间的一个字”“姓氏加名字中间一字”“姓氏”等情况。一是在1950年致协商建国的重要人物陈叔通,回复工商户转业改组情况的信中,称其为“叔老”。二是在对工商界影响力强的陈叔通、黄炎培两位前辈共同致信时,也称“陈叔老、黄任老”。

对交往比较密切的社会名人或故旧好友,则称“某某兄”,其中“某某”又可分为“乳名”“名”“号”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是“某某”为乳名。上文提到的,在1936年8月致信学生时期和革命初期的好友易礼容时,称其为“韵珊兄”,其中韵珊为乳名。二是“某某”为名。在1944年11月致信交往甚多的老朋友郭沫若,盛赞其《甲申三百年祭》时,称郭沫若为“沫若兄”,其中沫若为名;同年,致信交往甚久的沈雁冰,关心其近况、并欲与其见面时,称其为“雁冰兄”,其中雁冰是名;在1958年致信早年同事、交往甚密的周谷城,祝贺其大作即将出版,但回绝作序之事时,称其为“谷城兄”,其中谷城为名。三是“某某”为号。在1951年3月致信老同事、老朋友李达,感谢其解说《实践论》,并希望其多宣传普及唯物论时,称其为“鹤鸣兄”,其中鹤鸣是李达的号。

对在一起工作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等一般党外知识分子同事,则称为“某某同志”,其中,“某某”可以分为“姓名”“名”等不同情况。一是“某某”为姓名全称。1941年,著名作家萧军在延安从事文艺工作,毛泽东致信萧军,与其讨论问题交换意见,称呼为“萧军同志”;同样,1944年致信在延安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作家丁玲、欧阳山时,称呼为“丁玲欧阳山二同志”。二是“某某”为名。1939年萧三在延安从事文艺工作,毛泽东致信萧三对其作品进行盛赞时,称呼为“子暲同志”(注:萧三,原名萧子暲);1947年,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任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毛泽东致信范文澜探讨史学问题,

称呼其“文澜同志”;另外,与著名诗人臧克家探讨作诗时,称呼其为“克家同志”等。

当然,毛泽东致信时对一个称呼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系的改变或职位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如对宋庆龄的致信称谓由最初的“庆龄先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宋副主席”,再到“亲爱的大姐”,这种称谓的变化,表现出毛泽东对宋庆龄从交往不多前的尊敬,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共事的增多,两人关系逐渐密切的亲近^[3]¹³。对黄炎培的致信称谓也是如此,从“任之先生”到“黄任老”再到“黄副总理”。又如,对沈钧儒的称谓也是变化的。1936年当其为上海联合救国会的领袖人物时称为“钧儒先生”,1948年,其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时,致信称为“衡山先生”(沈钧儒,号衡山),1953年,其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称为“沈院长”等。

总之,毛泽东致民主党派与知名人士信件的语言风格,正是其一贯倡导和要求的言之有物、情感真挚、有的放矢、语言鲜明等良好文风的生动实践与体现,从中也看到其广交深交民主人士,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习近平指出:“党的历史经验证明,文风不正,危害极大。它严重影响真抓实干、影响执政成效,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耽误实际矛盾和问题的研究解决。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讲话者、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导致干部脱离群众,群众疏远干部,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失去吸引力、感召力、亲和力。”^[4]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提出并力倡“短、实、新”的文风。这不仅是当下对党员干部在文风方面提出的新要求,而且是对毛泽东所倡导的优良文风的继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3] 刘光荣.毛泽东的人际艺术[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 [4] 中央党校举行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习近平出席并讲话[N].人民日报,2010-05-13(01).

(责任编辑:蔡宇宏)